致敬长征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

谋划与运筹

红军长征的决策与出发

□陈安 彭小青

1934年10月,为应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苏区也各自面临“围剿”的困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均先后开始了长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长征是如何决策的?红军长征又是如何出发的?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望90年前红军长征的壮烈辉煌,追寻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和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答案。

红军长征决策的缘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置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安内”的反动政策,向全国各苏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1933年9月,国民党以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全国各苏区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围剿”。其中,安排一半的兵力50万人,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红军虽英勇作战,但接连失利,遭受巨大损失,根据地日渐缩小,又错失了与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的机会。

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数千里之外的另一支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刚刚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然而,失败的敌人并不甘心。1934年10月,蒋介石对四川各路军阀,拨款240万元补充兵力和装备,总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与“围剿”中央苏区一个战术,企图消灭红四方面军。要再次应对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红四方面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从1932年12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用14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连续“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部队损失很大,鄂豫皖苏区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全国各苏区都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境地——这是红军长征决策时所面对的严峻形势。

红军长征决策的战略谋划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开始考虑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问题。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并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

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6月15日,共产国际召开会议,对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及其复电进行审议。6月16日,共产国际在复电中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要求:一是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二是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三是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四是“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的这个“六月电报”,成为中共中央组织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性文件。

8月15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埃韦特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

9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安排部署中央苏区留守力量,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苏区;下发《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等文件,派遣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并传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鄂豫皖省委据此作出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等。

至此,红军长征决策最终完成。

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的结果。历史和实践证明,90年前的红军长征决策,是一次出奇制胜、影响深远的军事决策。

战略转移前夕的运筹部署

中共中央在谋划战略转移决策的同时,进行了探路调敌、谈判调研等战略部署,秘密进行了有关准备工作。

派出先遣队探路调敌,实行战略配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征。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转战3个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此次先遣北上,虽然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但是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8月上旬,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湘赣苏区西进,此举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红六军团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等4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在10月24日和红三军(原红二军团)会师。红六军团不断把沿路情形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也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行进的。

谈判调研,选定转移路线。1934年9月,毛泽东专程到于都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毛泽东召开各种调查会,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军的动向,然后急电报告周恩来详情。这封电报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转移的决定。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夕,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密使带亲笔信悄悄来到瑞金,希望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回信,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会谈。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会昌县筠门岭的罗塘(今属寻乌罗珊乡)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紧张谈判,最后达成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用陈部护照。由于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减少了红军的损失。

战略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工作是秘密进行的。1934年8月,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安排。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扩大红军是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工作。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在5月至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万余名。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5个单位,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苏区在9月动员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万余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9月,中央苏区共动员8万余名新战士充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苏区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时“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上战场”的感人场景随处可见。

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为筹措军粮,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于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决定向苏区群众借谷60万担。这两次筹粮计划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都胜利完成。

为补充武器弹药,红军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和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卖给政府。从1934年6月到8月,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根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保障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供应。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费需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国家银行原在石城烂泥坑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保存有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集的金银财宝。突围转移前夕,这些储备也全部取出,提供军用。

红军战略转移,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如果没有周密和充分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所说,中国共产党为西征做了多方面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西征的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各红军部队踏上征途

长征出发,包括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后红二、红六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出发。按照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对战略转移进行了部署和行动。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北各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离开原来的苏区,开始长征。

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即贡水)。就这样,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苏区,告别了亲人,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桐柏山进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出发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对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同时声明:北上沿途,国民党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这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

1935年3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了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方针,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的机动作战,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于4月初渡过嘉陵江后,经过20天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解放了青川、平武、北川、梓潼等9座城镇。5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继续西进,攻占茂县、理番等地,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懋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从强渡嘉陵江起,红四方面军就实际开始了长征。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追堵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于11月4日召开会议,决定转移到湘黔边广大地区。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天晚上,红二、红六军团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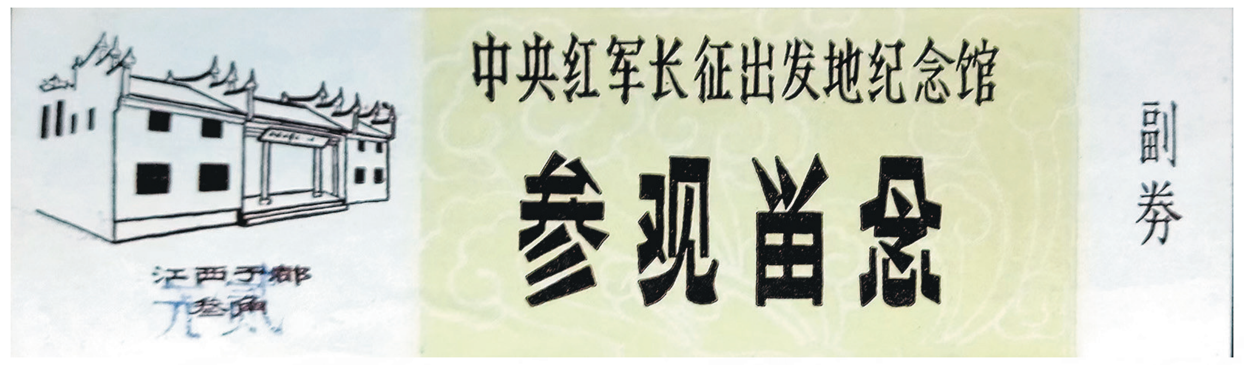
随后,南方各苏区相继陷于敌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藏品

与长征有关的参观券

□古向东 文/图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参观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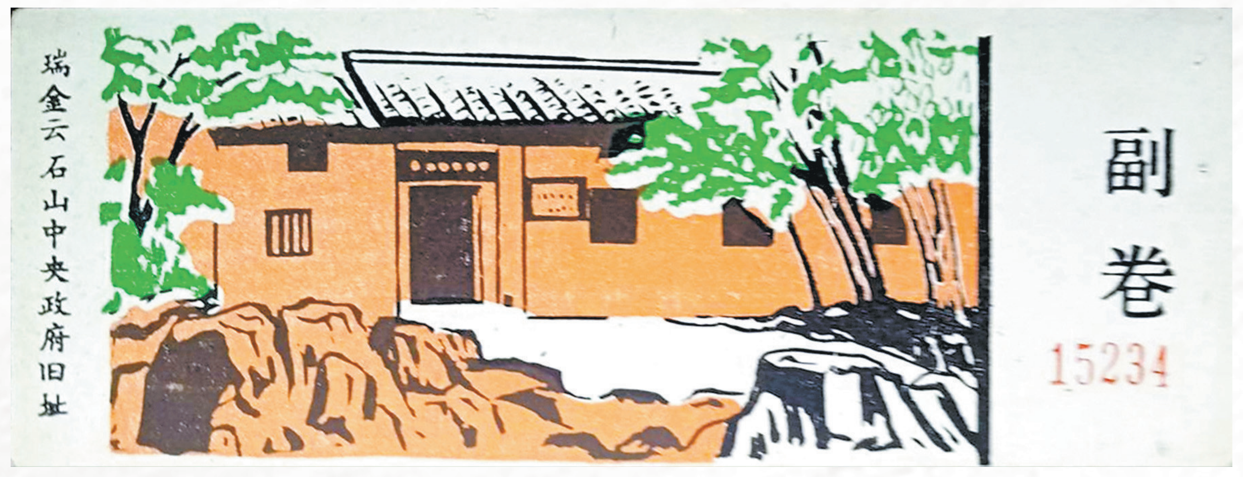
笔者收藏的长征参观券中,有2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参观券。有一枚参观券中间上书“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参观留念”两行醒目大字,左边是始设在于都县城谢家祠的纪念馆图案,往下有“江西于都,叁角”的字样。从参观券标价看,是该馆十分难得的早期参观券。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始建于1986年10月,馆址原设在于都县城谢家祠。2004年4月,更名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纪念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从准备到出发的全过程,是目前全国著名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主题性纪念馆。

2009年,于都县又投资近千万元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进行了扩建,新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由主题雕塑、集结广场、纪念广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贯穿其中的步行道像一条飞舞的红飘带将各部分连接在一起。纪念广场中间铺设了一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还有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座上的三幅巨型浮雕,分别以“集结”“出发”“奉献”为主题。

如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是全国红色旅游精品景点。

瑞金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参观券



笔者收藏了一张20世纪60年代的瑞金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参观券。参观券上印着的云石山革命旧址图案。云石山位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山上有一座云石山古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一个驻地。

193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在瑞金沙洲坝下霄村杨氏宗祠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从6月底7月初始,开始了突围转移的各项秘密准备工作。7月15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发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初,在云石山古寺里签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共同签署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这是毛泽东在瑞金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接着,毛泽东在古寺里召开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

10月8日,中共中央在云石山马道口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10月9日,中革军委在云石山梅岗作出《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梅岗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出发的第5号命令。按照5号命令的要求,由苏区中央首脑机关组成的军委第一纵队(即红星纵队)在云石山马道口编队,军委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在云石山梅岗编队。下午5时许,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从这里开启征途。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云石山革命旧址群未遭到敌人的破坏,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家书

“不愧父母生我”

——品读烈士王志发红色家书

□记者吴悦 通讯员刘海 邓君 文/图

90年前,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的壮举,谱写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立起了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从长征英烈的家书中解读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探寻长征胜利的力量之源。

在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珍藏着烈士王志发的家书,它们记录了王志发从参加长征到抗战直至为国牺牲的光辉足迹。

王志发,原名王廷凰,1913年出生于兴国县兴莲乡长塘村一户贫苦农家,17岁参加红军。

“廷凤胞兄台鉴。自从离家迄今五六年。这几年为救国救民的事业而奋斗;从南至北转战千里。我们红军这种艰苦奋斗的伟大革命精神为全中国同胞钦仰和赞叹。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弟弟在红军中的工作,现在为着准备抗战正积极训练。除给战士进行教育外,生活很快活,学习也很进步,身体也好,望勿挂念。”写下这封信时,24岁的王志发已随红一方面军辗转过二万五千里征程,在山城堡打了长征的最后一仗,随红一军团二师抵达甘肃宁县驻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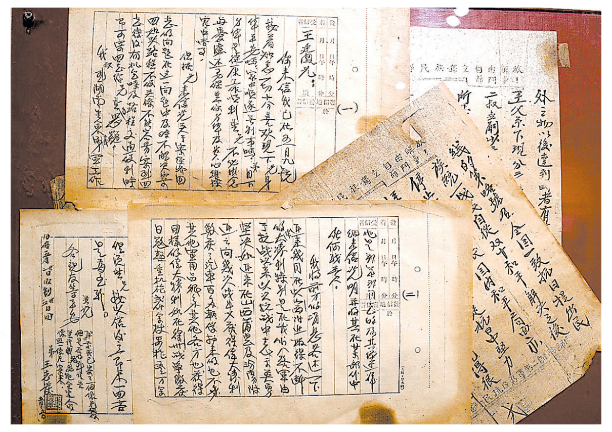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王志发所在的红二师五团驻扎在甘肃宁县早胜镇。红军经历了艰难险阻,直到那时,才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他才可以坐下来,写一封家书。据我们了解,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在长征胜利结束不久,提到长征的家书是非常少的。王志发的家书就显得非常珍贵。”兴国县史志研究室党史专家黄晓明向记者介绍。

王志发随部队离开兴国后,不久父亲去世。只剩下兄长王廷凤独自一人抚养母亲。得知消息的王志发悲恸不已,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好男子为国出力,现在国家危亡,匹夫有责者是光荣的。我想家人是知道的。”信中透露了为国尽忠而无法尽孝的愧疚之情,亦体现出为国为民的无上荣光。

1938年6月,王志发在信中写道:“近来几月,在以山西附近取得不断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在我们八路军,由于抗战以来,以抗战中表示英勇坚决,如近来在山西蒲县及汾阳之间几次战斗又获得伟大胜利,缴获了汽车百多辆。很多其他各方也获得同样的伟大胜利。如在徐州缴获日寇轻重机枪……捉拿日寇活的万余名。日寇现今无办法只有死路。”

信里提到的“山西蒲县及汾阳的伟大胜利”,指的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王志发所在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受命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此后,王志发还参加了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伏击战。王志发信中提到的徐州胜利,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首次重大胜利的台儿庄大捷。

“望兄切勿远念,只要把日寇驱逐国外时,弟就可回来与兄见面,切不食言。但须望兄接此信后立即来一回音,是为至盼。”王志发为了驱逐日寇浴血奋战,期盼抗战胜利后与家人团聚。“须”“立即”“至盼”……字字体现了王志发对家中牵挂。与此同时,哥哥王廷凤也无比期待弟弟从战场上寄来的家书。每当收到信,王廷凤只敢悄悄找来小舅子,拴上家门,让他把信念上一遍又一遍,和老母亲一同拭泪。但1939年后,王廷凤就再没收到过弟弟的信了。


烈士王志发家书。(资料图片)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返乡探亲的老红军在圩镇上认出了王廷凤,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942年底,王志发在山东单县“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王志发的最后一封家书珍藏在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文物登记表上这样记载:王志发同志为了夺取祖国壮丽的河山,驱逐日寇,光荣牺牲了。而寄信的地址,正是他牺牲的鲁西地区。

王志发在最后一封寄往家中的信中写道:“别家数载,时常挂念,奈何隔山绕水,千里遥遥,令人断肠……虽然表面上看来,没有做父母之孝子,兄却孝天下父母矣(中华民族父母)。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国土,兄也尽忠国家矣。孝有忠全,不愧父母生我。兄弟见谈有期,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他日回家,共享自由幸福新中国建设成功之太平年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志发的家书里多次提到这个。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毅然决然参加红军。”黄晓明介绍道。在王志发的家书中既能看到他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壮志雄心,又能体味到他忠孝不能两全的悲壮遗憾。当年,红军将士凭着“永远跟党走,一心为人民”的坚定信念,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一支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

故事

红军兄弟美名扬

□肖兆生

相约参军赴疆场,
枪林弹雨炼成钢。
戎装虽脱志犹存,
红军兄弟美名扬。

宁都县会同籍的肖克清和肖长清,是从田埠霄高肖氏人家走出来的两位老红军,他们同宗同房同辈分,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相约参加红军后,长征途中相继改名,战争岁月相互鼓励,半个多世纪以名励志,人如其名,传为佳话。

大哥肖克清原名肖先富,1903年出生在会同村排上,五兄弟中排行老大。其父为祈愿家中富贵,分别为五个儿子取名叫先富、先发、先寿、先福、先贵。然而事与愿违,荣华富贵岂能降临到穷苦百姓的家中?迫于生计,除一大一小外,中间3个儿子均过继给族人。

1932年6月,已有一年多党龄的肖先富瞒着父亲和妻女毅然参加了红军,两年后随部队渡过于都河踏上了西进北上的漫漫长征路。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肖先富先后任红军总部三科司务长、副官。他长得高大,年纪又偏大,毛泽东、朱德都亲切地叫他“大老肖”。在遵义休整时,一天党小组会结束后康克清大姐叫住他说:“先富啊,你这个名字叫起来挺别扭,现在老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先富起来呢?依我看,你这个名字得改一改。”怎么改?没有多少文化的肖先富犯难了。

几天后,肖先富见到康克清,说明原委后请康克清帮其改名。这时,朱德路过,见他们在说话就问:“你们在聊什么呢?”康克清如实相告,朱德听后哈哈大笑:“这好办,干脆你也叫‘克清’吧,这样我身边就有一男一女两个克清喽……”肖先富为难起来,红着脸说:“总司令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敢跟大姐同名呢?朱德把手一挥:“同名怕什么?只要你牢记它真正的含义就行。”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康克清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献身革命,就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无愧红军的称号。”朱德、康克清为肖先富改名肖克清的事,一下子就在总部机关传开了。后来,毛泽东曾当面称赞说:“你这名字改得好!”

两个月后,比肖克清小7岁的同乡小弟肖先荷随陈云来到红军总部,两兄弟意外相见格外兴奋。言谈中得知大哥改名叫克清,小弟已是陈云的警卫员,历经短短几个月血与火的洗礼,各自都有了长进,兄弟俩甚为高兴。回去的路上,肖先荷跟陈云说:“朱总司令和康大姐为我大哥肖先富改名叫肖克清了,我的名字也要改,首长您帮我改改吧。”陈云拍拍肖先荷的肩,笑笑说:“好啊,他肖先富改肖克清,那你肖先荷就改肖长清吧,我们共产党红军打下的江山,就要万古长青……”肖先荷听了高兴地跳起来。

爬雪山前,肖克清与肖长清再次相遇,他们互相鼓励,互道珍重。临别时,肖克清送给肖长清3个干辣椒御寒,到达延安后,肖长清还一直珍藏着一个。部队安顿下来后无需天天行军打仗,但他们各自忙碌、无暇见面,直至各自奔赴抗日战场。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到长征结束,肖克清毫发未损,但在抗日战场上却两次负伤而致残,从此不得不离开部队在后方疗养,到1950年冬全国解放后返乡。

肖克清回到家乡的四十多年中,时刻铭记康克清的谆谆教诲,不忘为民初心和长征精神,关心参与家乡建设,以一个老党员的高风亮节,为党旗增辉。肖长清则在解放战争中转入华东军区警卫营,新中国成立后转业至江西省建工公司任职,直至1962年退休回宁都定居。

据肖氏族谱记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仅霄高肖氏人家就有75名肖氏儿郎参加红军,73名牺牲在反“围剿”战场和长征途中,成为革命烈士。

↑长征期间使用的马灯。(博物馆展品)

↑一双绣球草鞋。(博物馆展品)